

## 參加「中國的紅色遺產」國際學術會議感想

應邀到哈佛大學參加一場國際研討會，主題是「紅色遺產」（Red Legacy），召集人是王德威教授。參加的學者來自美國、中國、香港，我是惟一來自台灣的受邀者。大會的焦點集中討論六十年來中國在政治、社會、思想、文學、藝術的成就及其影響。赴會之前，一直期待能夠與北京電影學院的崔衛平教授見面。

四月二日開會當天，大會宣布崔教授未能取得出境許可，因此只能缺席。崔衛平是誰？對於台灣學界而言，她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是，在中國思想界，她是一位矚目的人道主義捍衛者。四月三日輪到她的議程時，大會為她宣讀了一封公開信〈參與到共同的歷史中去〉。缺席的崔衛平，以她平實、誠懇卻又極其動人的語言充塞整個會場。她說，遺產絕對不只是遺產，而是活生生與當代社會緊密聯繫在一起。她的公開信舉出三個禁忌的故事。第一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第二是劉曉波博士起草的「零八憲章」，第三是一九七九年發生的「遇羅克事件」。這三個事件都在文革結束之後次第發生，分別代表中國境內的人權、人道、人性問題受到何種待遇。這三個故事極其巧合地發生在逢九的年代，時間與事件的內容也許並不盡然相同，卻都牽涉到同樣的主題：人的價值是什麼？

從未謀面的崔衛平教授，以最清晰而堅毅的聲音出現在會場，她的語言擊打著關切人權、關切言論自由的每一個良心。過去發生過的傷害歷史全然沒有過去，而是換成另一種形式再度回來，而且不斷回來。遠在異域的波士頓，「遺產」的意義竟然產生全新的精神，對著不分國籍的學者強烈召喚。她說：「被認為是過去的東西，實際上許多仍然以『現在時』的方式正在進行，這就是我們身處 其中的現實。」至少有一個強烈的信息縈繞在每個人的心中，北京決策者到今天還是不停複製著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思維方式。凡是不符合當權者的理念或立場，都一律視為異端邪說。這種潛在的危機，當然不會只是徘徊在中國境內，它也會溢出流淌在國際社會。崔衛平被禁出境，等於也是粗暴傷害了國際會議的言論自由空間。

當台灣與中國開始密切討論兩岸經濟合作之際，經濟問題並不只是停留於經濟層面。當我方代表向中國提出撤除飛彈時，北京的回答是這不在討論範圍之內。這樣的答覆，豈非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感同身受的嗎？歷史事件是屬於歷史問題，學術討論則屬於學術問題，都是從政治權力的干涉中孤立起來，甚或抽離出來。然而，在必要時刻，政治權力竟然可以貫穿所有不同的孤立領域，進行無情的壓制與干涉。

北京奧運與上海世博確實證明中國已經崛起。但是，物質崛起與經濟崛起並不等於人的崛起。中國民族主義的風潮，在奧運與世博中推向

高峰，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在民族主義戰勝一切的年代，人的價值究竟放在什麼位置？中國曾經是受到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人性受到踐踏汙辱。如今，中國站起來的時刻，不僅不再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反而具有實力可以領導全世界。爲什麼中國境內的人性還受到踐踏汙辱？中國果真已經擺脫文化大革命的災難？

## 葉石濤與陳映真

### 八〇年代台灣左翼小說的兩個面向

陳芳明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葉石濤與陳映真在一九八〇年代完成的左翼小說，既是向戰後初期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致敬，也是向台灣資本主義的威權體制表達最大抗議。兩位作家同時以小說形式重新建構失落已久的記憶，自然有其微言大義。在極端反共的台灣社會，凡屬左翼思考者，都很難獲得生存空間。那不僅是當權者刻意予以污名化與妖魔化，甚至還繼之以絕情的追緝與逮捕。反共思維早已上升成為整個社會的主流論述，社會主義者既被官方視為異端，也在民間視如寇讎。左翼運動的大逮捕經驗，不僅發生在日本殖民統治的一九三〇年代，也見諸於國民黨統治的一九五〇年代。縱然國民黨政府在教育宣傳上是何等鼓動反日情緒，卻在反共立場上與日本殖民者形成奇異的共犯結構。

但是社會主義思想並未從此根絕。葉石濤與陳映真對曾經有過的左翼歷史表達強烈的鄉愁，正好顯示台灣知識份子的理想主義未曾熄滅。兩位作家不約而同對深邃的左翼史投以回眸，恰如其分反映了解嚴前後思想騷動的跡象。那樣的騷動可能並不等於左翼運動復活，無寧是台灣文學內部緊張關係的一種延伸。葉、陳兩人的書寫具有高度象徵意義，他們分別被公認是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擘建者；或者更確切來說，正是坊間所謂獨派與統派的指導者。因此他們藉由小說形式回顧五〇年代左翼經驗時，儼然構成一種細緻的對話，並且也營造一種迂迴的對峙。兩人的書寫並不能視為虛構，在其背後可以拉出一九七〇年代歷史詮釋權頡頏爭衡的緊張關係。

#### 台灣與中國意識兩條路線

葉石濤與陳映真的小說，其實是一整個世代知識份子在政治信仰與國家認同在內心糾葛的縮影。加諸他們生命之上的歷史重量，也許不能單純以統獨的化

約概念來定義。複雜的政治條件，迫使他們在極右社會尋找精神出口。那是一條艱難而挫折的心路歷程，他們的追尋並不必然有確切答案，卻必須耗盡一生全心投入。

台灣的反共始於日據時期，國民黨的反共則始於一九二〇年代。國民黨撤退到台灣時，已在內戰中徹底失敗。因此，在反共之餘，又有強烈的恐共情結。凡是中國共產黨所尊崇的，國民黨必然刻意貶抑。<sup>1</sup>高度的思想檢查，規範了親美、親日、反共的心靈框架。但是，這並不意味一九五〇年代沒有左傾知識份子。國民政治的高壓統治，以及海峽的隔絕封鎖，反而使許多知識青年對中國共產黨懷有無可言喻的嚮往。一九二五年出生的葉石濤，在早年偷偷閱讀社會主義書籍，顯然是希冀在國民黨三民主義思想教育下尋找救贖之道。一九三七年出生的陳映真，則在一九六〇年代以後開始接觸艾思奇的理論書籍。他們之間的年齡相距十二年，但都同樣受過日本教育，等到能夠獨立思想時，台灣的戒嚴體制已然成形。在冷戰時期，台灣被整編到資本主義陣營，左翼道路全然受到阻絕。葉石濤在一九五二年因讀書會事件而被監禁兩年，陳映真在一九六八年也因為讀書會事件而被判刑十年；直到一九七五年蔣介石去世而被特赦提早三年出獄。

在國民黨建構起來的右翼社會，凡是知識青年都受過右翼中華民族教育。這樣從文本形塑起來的中國意識，其實並沒有物質基礎。想像中的中國圖像，是靜態而平面的虛構。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歷經整風運動、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的改造，台灣教育體制裡的中國形象仍然維持不變。台灣青年認識的中國，是懷舊病中的中國，已經是一去不復返的中國。由於台灣代表中國的合法，是依賴美國在聯合國的支持，而台灣內部也依賴所謂的代表中國的國民大會與立法院在支撐，因此中國論述在島上得以獲得生存的空間。

右翼中國意識，或國民黨式的鄉愁，在進入一九七〇年代前後，開始遭到國際形勢的強烈挑戰。首先是冷戰體制的動搖。美國資本主義在戰後長期與共產陣營的對峙，對其經濟基礎構成嚴重傷害。為求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遂決定調整其全球戰略。尤其陷於越戰的泥淖之際，美國亟思改變其好戰擴張的策略。以對話代替對抗的思維方式，在一九六〇年代末葉逐漸出現端倪。反共不再是美國的主流論述，代之而起的是和解氛圍的營造。唯有在和解條件的配合下，資本主義才有可能獲得突破性的進展。

---

<sup>1</sup> 國民黨站在共產黨的對立面，極其鮮明地見諸於文化政策的實踐。例如，一九五〇年代以後，魯迅地位在中國直接上升，幾近於神格化；在台灣，魯迅則完全受到妖魔化。參閱陳芳明，〈魯迅在台灣〉，《典範的追求》，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頁305-339。

停留在國共內戰思維的台灣，仍然還訴諸於反共論述。但是，在經濟政策上卻開始被迫調整。其中最重要的指標，便是在島上建立龐大的加工出口區。這是一個結束的開始，資本主義在台灣產生劇烈的改造。爲了配合加工區的設置，台灣投入規模空前的十大建設，正是在這段期間見證第一條高速公路的完成。同時，國民義務教育也延長至九年，國中制度正是在此期間適時完成。

台灣內部在迎接重大經濟改造之際，在國際上也面臨立即衝擊式的變動。一九七〇年發生釣魚台事件，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二年周恩來與尼克森發表「上海公報」。從此，台灣陷入長期國際孤立的狀態。面對變局的到來，蔣經國著手推行本土化政治，並且也開放局部性的國會選舉。政治形勢急轉直下，官方的本土化政策一旦啓動，立即刺激潛藏在社會底層的文化能量。來自民間的回應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草根型民主運動的崛起，一是本土性鄉土文學的上升。<sup>2</sup>

當時還在獄中的陳映真，也許已經知道獄外的社會已開始一連串的變革，但他無能爲力。葉石濤的期待，正式與他的時代展開適時的精神會盟。遠在一九六五年，他已發表一篇預言式的文章〈台灣的鄉土文學〉，透露他蓄積已久的心願：「我渴望蒼天賜我這麼一個能力，能夠把本省籍作家的生平、作品有系統的加以整理，寫成一部鄉土文學史。」這樣的願望在鄉土文學運動起步之際，就立即獲得實踐空間。

七〇年代鄉土文學之蔚爲運動有幾個跡象：第一、對於現代主義文學開始嚴厲批判，最具體的行動見諸於尉天驄創辦的《文季》，連續對台灣現代詩，以及張愛玲、歐陽子、王文興進行批判。第二、戰後世代的作家次第在文壇登場，包括李昂、宋澤萊、洪醒夫、吳錦發、林雙不，大量寫出他們的農村經驗與鄉土生活。第三、新世代作家活躍之際，也與黨外民主運動保持和諧的互動。文學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頻繁對話，漸漸釀造台灣意識的成熟。

台灣意識的成長極爲迅速，不僅是因爲有新世代知識份子的投入，更重要的，這樣的意識在台灣社會找到穩定的物質基礎。一九七五年是非常關鍵的年代，遠在中南半島的越戰終告結束，美國以極其難堪的姿態脫離戰場。在這重要時刻，台灣的強人蔣介石也猝然去世，彷彿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支配將近二十餘年的反攻大陸的口號，至此證明是無法實踐。對於當時的鄉土運動與黨外運動，

---

<sup>2</sup> 鄉土文學運動與黨外民主運動雙軌發展的解釋，參閱陳芳明，〈七〇年代台灣文學史導論：一個史觀的問題〉，《典範的追求》，頁 222-234。

國內外的政治事件無疑帶來巨大衝擊。黨外運動中前所未有的刊物《台灣政論》，便在此時正式出版。這份政論性的雜誌前後只發行五期，卻強烈暗示台灣意識日漸臻於成熟。鄉土作家與黨外人士都同時參與政論文章的撰寫。

同樣在一九七五年，陳映真因蔣介石去世而獲得特赦釋放。閱讀過馬克思主義書籍的陳映真，遠在一九六六年就曾批判過現代主義在台灣的傳播。那些早期文字，後來都收入《知識人的偏執》一書。帶有左傾思想的陳映真，出獄後立即與蘇慶黎合辦《夏潮》，一份具有強烈批判的雜誌於焉誕生。蘇慶黎的父親蘇新，是日據時期台灣共產黨的一位重要領導人。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逃亡香港，稍後於一九四九年前往北京，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共黨員。《夏潮》的發行，也許與早期台灣左翼運動沒有直接血緣的關係，但是由陳映真與蘇慶黎主導，確實使消失已久的社會主義批判又重新復活。這份刊物是反美日帝國主義為精神主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直接批判國民黨的右翼統治。《夏潮》發行之初，與黨外運動維繫聯盟式的往來，還未彰顯其中國意識的傾向。

從雜誌內容來看，《夏潮》有意把中國三〇年代的左翼思潮與日據時期三〇年代台灣左翼文學互相銜接。架構起中國現代史與台灣文學史的聯結，也就是陳映真日後文學論述積極追求的方向。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觀建構過程中陳映真的中國意識與葉石濤的台灣意識無可避免產生交鋒。

葉石濤在一九七六年五月的《夏潮》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鮮明地在文章中提出「台灣意識」一詞：

台灣一直在外國殖民者的侵略和島內封建制度的壓迫下痛苦呻吟，這既然是歷史的現實，那麼，反映各階層民眾的喜怒哀樂為職志的台灣作家，必須要有堅強的「台灣意識」才能了解台灣社會現實，才能成為民眾真摯的代表人。唯有具備這種「台灣意識」，作家的創作活動才能紮根於社會的現實環境裡，得以正確地重現社會內部的矛盾，透視民眾性靈裡的悲喜劇。當一個作家在描寫他生存的時代時，現實的客觀存在固然會決定作家的意識，但作家的意識也會反過來決定存在；而這時候，構成作家意識的重要因素之中，積累下來的民族的反帝反封建的歷史經驗，將佔有一方廣大的領域。民族的抗爭經驗猶如那遺傳基因，鏤刻在每一個作家的腦細胞裡，左右了他的創造性活動。台灣作家這種堅強的現實意識，參與抵抗的精神，形成台灣鄉土文學的

傳統，而他們的文學必定是有民族風格的寫實文學。<sup>3</sup>

台灣意識是台灣作家與台灣社會交互作用的歷史產物。這種提法對於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運動誠然提供了具體辯證。這篇導論，後來就成為鍾肇政、葉石濤主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十二冊（台北：遠景，1979）的總序。從馬克思的基本論點出發，葉石濤在解釋殖民地台灣文學時，已經照顧了作家的歷史環境與經濟條件。

出獄甫一年的陳映真，立即撰文回應葉石濤。在題為〈台灣鄉土文學的盲點〉之駁論中，他集中於兩個焦點：第一、「『台灣立場』的最初的意義，毋寧只有地理學的意義。它在近代的、統一的中國民族運動產生之前，相應於中國自給自足的，以農業和手工業為基礎的中國社會經濟條件，而普遍存在於中國各地。」第二、他認為台灣人意識只存在於資本主義過程中新近興起的市民階級中，陳映真特別強調：

在日治時代的台灣，是農村——而不是城市——經濟在整個經濟中起著重大作用。而農村，卻正好是「中國意識」最頑強的根據地。再就城市來說，由於台灣籍資本家也同受日本殖民者在經濟上、政治上的壓迫，有反日的思想與行動。而這些城市中小資本家階級所參與領導的抗日運動，在一般上，無不以中國人意識為民族解放的基礎。這是只要熟悉日治時代台灣民族運動和文學運動的人所深刻理解的。因此，在這個階段中的「台灣意識」，除了葉（石濤）先生所不憚其煩地、堅定指出的「反帝反封建」的現實內容外，實在不容忽略了台灣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社會、政治和文學運動不可分割的，以中國為取向的民族主義的特質。<sup>4</sup>

陳映真提出「中國意識」一詞，為的是收編葉石濤的「台灣意識」。不過，文中所說台灣農村是中國意識最頑強的根據地，又說台灣反日、反封建的殖民地抵抗運動，都具有以中國為取向的民族主義特質，顯然在台灣史實中找不到證據。<sup>5</sup>葉、陳之間的討論並沒有進一步的延伸思辨，因為兩篇文章發表之後，台

<sup>3</sup> 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夏潮》，第14期，1977年5月。

<sup>4</sup> 陳映真，〈台灣鄉土文學的盲點〉，《台灣文藝》，革新第2期，1977年6月。

<sup>5</sup> 關於葉、陳之間的討論可以參閱宋冬陽（陳芳明），〈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放膽文



灣鄉土文學論戰就在一九七七年爆發，中斷了兩人的思想互動。但是，非常清楚的事實是，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在七〇年代以降就成為鄉土文學中兩條鮮明的路線。他們的議論充分顯示，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在作家之間的影響與支配已經式微。或者更清楚而言，官方的右翼中華民族主義已失去舉足輕重的地位。正在崛起的是左翼台灣史觀與左翼中國史觀。從這樣的角度來觀察葉、陳在一九八〇年代書寫的左翼小說，無疑是他們在七〇年代未及完成的對話與對峙之延伸。

### 葉石濤：怯懦的左翼人物

檢視葉石濤在六〇、七〇年代的小說與文論，當可發現他的小說創作與文學批評其實是沿循不同書寫策略。他在六〇年代以後完成的短篇小說《葫蘆巷春夢》與《羅桑榮和四個女人》，運用唯美浪漫主義的技巧，小說人物頗耽溺於幻想與情慾。但是他的文學評論如《台灣鄉土作家論集》、《走向台灣文學》，則自始至終主張寫實主義的審美原則。擺盪在浪漫主義與寫實主義之間，可能是屬於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畏縮型的小說與進取型的評論，構成葉石濤奇異的文學風景。

但是，進入一九八〇年代左右，他的文學生涯出現重大轉折。首先是他畢生所追求的台灣文學史書寫開始進入實踐階段，而終於在一九八七年正式出版《台灣文學史綱》。<sup>6</sup>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他毅然重新回顧五〇年代曾經有過的牢獄經驗。這是因為威權體制在八〇年代之後已經發生鬆動現象，使許多被壓抑的記憶與思想在政治縫隙中破土而出。葉石濤最早吐露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大約是一九八六年左右。他自剖思想歷程轉變的苦痛：「從青春初期的日文轉移到中文是一個艱辛的過程，從拋棄法西斯軍國主義的遺毒，到接受科學的社會主義是一個過程，從科學的社會主義到社會民主主義又是另外一個過程。」<sup>7</sup>這種轉折歷程看似非常簡略，背後其實暗藏複雜的歷史演變。從日文思考到中文書寫，足以道盡殖民地知識分子在歷史轉型期面臨的考驗。語言原來是作家的基本利器，只因政權的轉換而必須改變語言使用，正好彰顯台灣作家的精神苦惱。其中實際還

---

章拼命酒》，台北：林白，1988年，頁35-60。

<sup>6</sup> 葉石濤文學史工程的相關討論，參閱陳芳明，〈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觀之建構〉，收入《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2002年，頁47-69。-

<sup>7</sup> 葉石濤，〈沉痛的告白〉，《中國論壇》，第30期，1986年5月。後收入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台北：前衛，1991年，頁5-29。

牽涉大和民族主義過渡到中華民族主義的試煉。這正是葉石濤自謂的「拋棄法西斯帝國主義的遺毒」。

不過，更具關鍵的轉變，見諸於「從科學的社會主義到社會民主主義」的轉移；前者意味著他五〇年代所接受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思想，後者則是指七〇年代他以左翼思維介入黨外民主運動。這種哲學層次移動，無疑是相應於台灣社會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轉變。這種告白必須等到七十歲以後才發抒出來，正好反映了他在長期白色恐怖陰影的畏怯。葉石濤親自參加過讀書會的活動，並且被逮捕監禁三年，在回憶之際，筆下文字從未有任何膨脹誇張之處。他反而仍然保持拘謹之心，謹慎描述他曾經有過的恐懼經驗。他的自畫像，呈現的絕對不是英雄，而是一位懦弱卻又懷抱理想主義的書生。觸及自己的思想時，他的定義近乎模糊：「我以前接受過馬克思主義的洗禮，所以並不屬於資產階級的胡適等人舊自由主義者，我是帶有濃厚的社會主義傾向的新自由主義者。說穿了自由主義似乎是屬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常是搖擺不定，夾在極端的意識形態之中痛苦掙扎的夾心餅乾。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自由主義者絕對反對任何型態的獨裁統治和法西斯，他們追求的是民主與自由。」<sup>8</sup>

這是很傳神的描述，當他以自由主義左派自我定位時，足以道盡他在思想上的困境。這種中間位置，決定他不可能選擇激進的革命路線；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滿於獨裁統治，因此也決定了他消極的理想主義。或者確切地說，他是一位患有行動未遂者的知識分子。即使在他內心寧靜地釀造一場風暴，亦無法見容於當時的威權統治。白色恐怖帶來的震攝，竟有至於此者。

但是，暗藏在內心底層的社會主義嚮往，是否與中國內戰中，中國共產黨的節節勝利維繫密切關係？葉石濤的短篇小說〈紅鞋子〉，表現了他個人的思想傾向。〈紅鞋子〉是五〇年代在台灣放映的英國芭蕾舞星的電影故事，暗示了小說主角簡阿淘在觀賞影片後便遭到逮捕。這篇小說欲言又止，故事很不完整。小說暗示了主角與許多左翼人士有所往來，簡阿淘卻莫名地與他們斷絕連繫。故事最為關鍵處，出現在小說人物內心獨白：「我們台灣民眾的再解放，並不需要和祖國大陸的解放運動取得連繫。我們相信四百多年的台灣歷史，已經使台灣人締造了共同的歷史命運，唯有台灣人本身站起來，才能把台灣建設成爲『台灣人的台灣』這樣一個天堂。」<sup>9</sup>

---

<sup>8</sup>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頁 49。

<sup>9</sup> 葉石濤，〈紅鞋子〉，《紅鞋子》，台北：自立晚報，1989 年，頁 202-242。

這樣的發言，可能是葉石濤小說中政治立場最清楚的告白。然而，這似乎與故事裡懦弱的書生的性格極不協調。必須注意的事實是，小說完成於民主進步黨成功之後，也許葉石濤把他八〇年代的激情嫁接到白色年代。另一方面，小說人物的言談，似乎又迂迴回答他的論敵陳映真。畢竟在一九七六年陳映真發表〈鄉土文學的盲點〉之後，葉石濤從未正面回應，遂藉故事的虛構營造，順勢對台灣統派做出遙遠的答覆。

《紅鞋子》出版後，他緊接又完成《台灣男子簡阿淘》，幾乎可以反映葉石濤在那段時間亟欲傾吐他蓄積已久的內心語言。頗富自傳色彩的兩本書，集中在他旺盛的成長時期。他見證歷史的力量沖刷而來，許多人如果不是滅頂，便是隨波逐流。在蒼茫的水域裡，簡阿淘從來就沒有扮演過英雄的角色。在葉石濤的歷史小說中，根本沒有任何堅毅人格的登場。唯其如此，他的故事才更接近歷史事實。「反英雄」的書寫，使每一位理想主義者都顯現匱乏的行動力。

怯懦的左翼人物，襯托出戰後台灣社會的悲劇。整個政治格局已經確立，任何的作為，甚至是激進革命行動，也無法使客觀環境有絲毫改變。然而，反英雄的書寫其實也是一種深沉的抗議。縱然小說中從未出現任何果決的行動，故事重現時就已經使黑暗的白色年代表露無遺。受到傷害的心靈通過書寫也許可以獲得治療，但葉石濤的心願恐怕不止於此。在委婉的描述裡，他刻意使隱晦不明的台灣意識獲得刷新，同時也使台灣得反對黨運動得到歷史詮釋。回憶不再只是單純的回憶，而是具體而微地勾勒當代史的形象。

### **陳映真：批判性的左翼人格**

陳映真在八〇年代，可謂進入他文學生產的豐收時期。以筆干涉政治文化與社會氣象，使他成為解嚴前後的重要聲音。他不僅發行以報導文學為主調的《人間雜誌》，在文學創作上則開啓三個主題：第一是以批判跨國公司為主題的《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第二是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為主軸的《山路》，第三則以兩岸關係的再連結為主題，完成一部《忠孝公園》。無論是雜誌出版，或是小說創作，都顯示陳映真的左翼思想有了生動的實踐。

早期的小說，陳映真酷嗜營造死亡的主題。至少在六〇年代現代主義作家的行列中，陳映真筆下的人物佔有最高的死亡率。在精神找不到出口的苦悶年

代，死亡主題的浮現，既是抗議，也是批判。<sup>10</sup>不過，出獄以後，陳映真見證台灣社會的高度資本主義化，反而死亡主題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活潑的行動。回應如此全新的時代，他的小說也產生巨大迴旋。正如回顧自己的創作歷程時，他說：「八〇年代開始，他從反省和批判台灣在政治經濟和心靈的對外從屬化的《華盛頓大樓》系列，轉折到以五〇年代台灣地下黨人的生活、愛與死為主題的《鈴鐺花》系列，是他把當代台灣人民克服民族內戰、克服民族分裂的歷史——台灣地下黨的歷史加以文學化的營為。」<sup>11</sup>

陳映真的創作企圖，與他的對手葉石濤所寫的小說一樣，都是把五〇年代歷史做為當代史來經營。對於白色恐怖時代的反省，陳映真確實比葉石濤的書寫還早。一九八三年台灣警備總部正式釋放最後一批長期政治犯時，引起社會的騷動。這些監禁將近三十年政治犯的出獄，無異是揭開台灣歷史的傷口。荒蕪，黑暗，近乎遺忘的記憶，轟然喚醒埋藏已久的痛楚。陳映真在稍後為一冊政治犯專書撰寫序文，表達如此沉痛的心情：「把五〇年代具有世界戰後史重大意義的白色恐怖犧牲者『非人化』，從而將白色大屠殺的歷史湮滅、遺忘和否認的手法，和湮滅一切殖民主義和法西斯暴行的手法如出一轍。在大恐怖中倖存下來，如今已屆七十暮年的被害者，便是長期在這污名化、『非人化』的湮滅、否認、狡猾和遺忘的冰山下被掩埋了五十年。五十年來，我們從來聽不到有人以活生生的人、和你我一樣普通人的面貌，出來為那殺戮時代、苛虐的歷史作見證。」<sup>12</sup>

對於一九五〇年代的政治犯逮捕，陳映真從全球冷戰的角度來解釋。他始終強調國民黨獵殺紅色分子，是因為受到美帝國主義反共政策的唆使。必須從這樣的立場發言，才能夠同時批判美國與國民黨的共犯結構。從歷史來看，國民黨的反共與清共，並非始於一九五〇年代。遠在一九二七年，清黨運動就已開始。不過，誠如陳映真所言，國民黨對左翼知識分子的虐殺與湮滅，是到台灣以後才變得更加高明而細緻。從冷戰觀點來詮釋高壓政治，自然是出於陳映真的悲憤。

在白色恐怖故事裡，陳映真塑造的角色都近乎英雄人格。最為驚心動魄的人物，莫過於〈山路〉中的女性蔡千惠。即使在形塑左翼批判故事，陳映真仍然無法忘情於他早年的浪漫理想主義色彩。小說重心並未放在左派黨人如何在獄中遭到肉身凌虐或思想改造，反而透過女性身體來襯托一個壯烈的時代。小說中被

<sup>10</sup> 陳映真小說中死亡主題的討論，參閱宋冬陽（陳芳明），〈縫合這一道傷口：論陳映真小說中的分離語結合〉，《放膽文章拚命酒》，頁 171-204。

<sup>11</sup> 陳映真，〈後街〉，《父親》，台北：洪範，2004 年，頁 67。

<sup>12</sup> 陳映真，〈在白色恐怖歷史的證人席上發言：序王歡先生《烈火的青春》〉，《海峽評論》，第 102 期，1999 年 6 月。

逮捕而終身監禁的黃貞柏，是蔡千惠的未婚夫，她所崇拜的組織領導人李國坤則遭到槍決。故事最為曲折離奇之處，在於這位女性謊稱是李國坤的未婚妻，自願來到李家侍奉老婦幼弟。蔡千惠以苦勞的方式，使李家生活環境獲得改善。這種贖罪式的行動，既不是為了填補黃貞柏的缺席，也不是為了完成李國坤的遺志，卻是為了履踐蔡千惠本人的左翼信仰。當她聽到黃貞柏在長期監禁後獲釋時，整個肉體驟然崩潰，開始厭食，終至枯萎而死。

蔡千惠的死，不像過去陳映真早期小說中的死，只是為了單純愛情事件，而是為了一個偉大的、無法實現的共產理想而死。蔡千惠的行為，或許竟如王德威所說，是「以一種緩慢卻堅決的姿態走向死亡，成就了終極荒謬（女）英雄的姿態，陳映真藉〈山路〉傾吐自己被壓抑的記憶，往時往事似乎至此隨風而去。如果共產主義總有一個時間表，〈山路〉的故事恰恰是個時間／歷史被錯失及錯置的悲喜劇。」<sup>13</sup>這樣的解釋當然是可以成立，卻還可以進一步引申。

陳映真與葉石濤的左翼史建構，正如前述，其實都企圖以小說形式解釋當代歷史，亦即他們所處的一九八〇年代歷史。在那段時期，是台灣經濟最好的階段。就像劉大任回到台灣，見證社會繁榮的景象而寫下〈台灣發了〉那篇短文。陳映真歷經鄉土文學論戰與美麗島事件之後，發現台灣安然被編入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在海峽對岸，中國也逐步邁向改革開放時期。因此，〈山路〉的誕生，無疑是各種歷史力量衝擊之下的產物。蔡千惠在故事最後留下給黃貞柏的一封信，其中寫下了相當關鍵的句子：「如果大陸的革命墜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於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sup>14</sup>

陳映真小說的批判張力，在此展現無遺。從技巧上來看，故事情節也許過於牽強，文字藝術似乎猶待鍛鑄，而小說最後的敘述又非常教條黏膩。但是，一九八〇年代的心情卻相當飽滿地容納於小說篇幅。他致力於左翼史的重建，最優先的假想敵當然是島內正處於上升狀態的台獨運動，因此堅持左統的理念，自然就在於稀釋台獨的力量。不過，陳映真最擔心的是台灣後現代主義的到來，以及中國社會主義路線的轉向。蔡千惠之死，絕對不是為了一個空洞的信仰，而是為了一個越來越具體的答案。五〇年代受害者的犧牲，竟然換來下一代的飽食富有。如果蔡千惠就是陳映真的化身，他最後的精神支柱恐怕就是中國社會主義終於也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對於左統的領導者陳映真，等於是站在歷史謎底就要

<sup>13</sup> 王德威，〈三個飢餓的女人〉，《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台北：麥田，1998年，頁240。

<sup>14</sup> 陳映真，〈山路〉，收入《鈴鐺花》（陳映真作品集5），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年，頁64。

揭開的當口。中國革命一旦墜落，精神與肉身是不是注定慢慢枯萎而死？

### 歷史反思或政治反諷？

台灣左翼史的重建，一直是處在零落狀態。當台灣越來越陷入資本主義化時，反共的思維其實是以各種幽靈形式不斷復歸。解嚴長達二十餘年之後，台灣右翼價值反而越來越強化。五〇年代的左翼運動者，面對越來越殘酷的現實，已經體認到世界改造的工程越來越成為不可能的任務。當客觀現實無法改造時，是不是左翼運動者必須自我改造？

葉石濤在八〇年代以左翼史觀建構《台灣文學史綱》時，至少還保留了實踐空間。解嚴之後，他才著手撰寫左翼小說。他的左翼小說顯然出現一種無力感，完全無法表達階級立場。當他的階級立場萎縮時，他的精神支柱只能選擇向民族主義傾斜。小說中一旦出現「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之類的語言，他的民族意識就已證明是強過他的階級意識，左翼價值已開始動搖。

陳映真的情況似乎更為悲觀，蔡千惠之死，絕對並不意味一位善良女性之死，而是一個理想主義的中國之死。在九〇年代初期完成的《忠孝公園》，集中營造大陸台籍人士的返鄉故事。在小說中，階級意識已是一息尚存，巍然崛起的竟是中國民族意識。

葉、陳二位的思想主軸，彷彿又回到一九七〇年代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兩條路線的發展。當全球化浪潮浩浩蕩蕩襲來，即使是共產主義國家也開啓門戶迎接資本主義湧進。葉石濤最後生涯投靠了民主進步黨，陳映真現在則寄托於中國共產黨。這兩個政黨都是以民族主義為訴求，也都以資本主義為最高價值。民進黨似乎已經遺忘當年崛起時勞工、農民的力量，中國共產黨也已遠離以農村為根據地的延安精神。葉、陳當年左翼小說傳出的抗議聲音，於今已飄逝在全球化的蒼茫大氣中。